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06

批判历史学的 前提假设



[英] F. H. 布莱德雷 著
何兆武 张丽艳 译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的观念译丛

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



〔英〕F. H. 布莱德雷 著
何兆武 张丽艳 译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英)F. H. 布莱德雷著;何兆武,张丽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12029-3

I. 批… II. ①布…②何…③张… III. 历史哲学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191 号

F. H. Bradley,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本书译自美国 Quadrangle Book 出版公司 1968 年版

中文(简体、繁体)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拥有

书 名: 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

著作责任者: [英]F. H. 布莱德雷 著 何兆武 张丽艳 译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029-3/K · 04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6.75 印张 85 千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布莱德雷 (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 又译布拉德雷, 是英国唯心论派 (或称新黑格尔学派) 最著名、最有原创性的代表。1846年1月30日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南克拉彭的一个牧师家庭。1865年进牛津大学, 1870年任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究员, 并保持这一身份到逝世。1924年9月18日死于败血症。布莱德雷是个书斋型的学者, 终生未娶。学术上, 他以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学的研究而闻名, 在世时即赢得了同时代英国最伟大哲学家的誉称。代表作除本书外, 还有《表象与实在》(1893)、《逻辑原理》(1883)、《伦理学研究》(1876) 等。

本书是布莱德雷在1874年发表的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尽管篇幅不长, 但它却是批判历史学的哲学反思的标志性的开山之作。同时, 本书适合作为布莱德雷哲学的入门读物, 其中不仅蕴含了其思想的若干要义, 而且体现了他鲜明的哲学风格, 例如典型的轻视例证, 以及按照现代标准来看艰涩的行文。

何兆武, 1921年生, 原籍湖南岳阳, 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毕业。先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长期致力于西方思想史和历史哲学的研究和译介, 翻译西方学术思想经典多种。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耶尔恩·吕森 (Jörn Rüsen, 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

张文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副主编

陈 新 (复旦大学历史系)

史蒂芬·约丹 (Stefan Jordan, 德国巴伐利亚科学协会历史委员会)

彭 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

编 委

何兆武 (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涂纪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美国斯坦福大学)

纳塔莉·戴维斯 (Natalie Z. Davis,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索林·安托希 (Sorin Antohi, 匈牙利中欧大学)

克里斯·洛伦茨 (Chris Lorenz,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于尔根·施特劳布 (Jürgen Straub, 德国开姆尼斯技术大学)

卢萨·帕塞里尼 (Luisa Passerini, 意大利都灵大学)

埃斯特范欧·R.马丁斯 (Estevao de Rezende Martins, 巴西巴西利亚大学)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 (Jürgen Osterhammel,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到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

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

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的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轻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

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 18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新

2006 年 5 月

译 序

历史哲学,亦即对历史进行一番哲学的反思,是古已有之的。但是要到 1951 年沃尔什(W. Walsh)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才正式提出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分,并且为不少的学者所接受,尤其是由于史学思想受到当代分析哲学与解释学的强大参与和推动的影响,批判的历史哲学似乎浸假有凌驾于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即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某种规律的发展历程)之上的趋势,至少在西方史学界是如此。在对历史哲学这种分野的意义上,可以说思辨的历史哲学无论中外都是古已有之的,而批判的历史哲学却要从 19 世纪的下半叶开始算起,更确切地说是从布莱德雷 1874 年《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一书的问世算起,迄今不过百有余年却已经成为显学,而同时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却显现出一片式微之势。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哲学界以所谓的“英国唯心论派”(或被称之为新黑格尔学派)独领风骚,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格林(T. W. Green, 1836—1882)、布莱德雷(F. H. Bradley, 1846—1924)、鲍桑葵(B. Bosanquet, 1848—1923)。格林在我国似乎很少为人注意,鲍桑葵的美学和哲学已经有人介绍,而布莱德雷的名著《表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一书则早在 20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即已为我国的哲学界所熟知。但是他最早的这部《批判历

史学的前提假设》受到我国史学理论界所应有的重视。这部批判历史哲学的著作,不但开批判历史哲学的先河,而且也孕育着他的《表象与实在》的哲学体系的若干重要思想。百年来我国的新史学似乎偏向于思辨的方向较多,而于批判方面的思路则显得重视不够。如果说历史研究就必须要有形而上学的前提假设,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同样地重视其知识论方面的自我批判呢?历史学不仅要研究历史是什么,而且也要研究我们的历史认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又:本书《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中的“批判”一词,原文为Critical,此词在中文中亦可译为“考据”。考据一词本来也就意味着是对史料的批判,亦即英文中的 textual criticism。而在中文中则“批判”与“考据”两词似乎其含意与用法均有所不同。希望读者能予以留意。

布莱德雷本书的行文有时颇为晦涩,某些译文是否正确或妥当,不敢自保。如蒙读者指出,下次重印时,当一一改正。

译者谨识

2006年春北京清华园

目 录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 I

译 序 / VII

序 言 /1

本书提要 /5

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 /7

一 历史的模棱性 /11

二 什么是历史事实 /17

三 历史学中的推论的性质 /25

四 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 /31

五 历史的推论与自然界的一致性 /35

六 非类比验证的问题 /41

七 历史证据的特点和历史学的限度 /45

八 历史与进步 /53

九 结 论 /61

附 录

注 A /71

注 B /78

注 C /79

注 D /84

注 E /86

布莱德雷著作要目 /95

序 言

没有一篇我自己对之颇为敏感的辩护词，以下的篇章就不会呈现于读者之前。它们的内容恐怕不会令人满意，它们的形式恐怕就更糟糕；不过我大概做不出什么变动能够改进它们了。我这些想法为什么要终于刊行出来，那原因就是我愿意并且希望着，它们会协助一些更有能力的人们一劳永逸地清理和处理一个应该加以处理的题材。

以下各页不合规范的标题就预示了它们的方法，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它们的结论。它们的方法就在于把某些事实的存在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力图发现那种存在的条件。这些条件由于其自身并不存在，便消灭了这些事实；因此事实就包含有这些条件，把它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把它们当作是前提假设。于是，结论就是：既然各种事实已经不自觉地预先假设了某项原则，所以现在我们在进行判断时必须自觉地从那种原则出发，并把它当作是一种信条来加以运用。

批判的历史学的题材，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狭隘。没有任何历史学不是或多或少在某些方面是批判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想把或是能够把全部流传下来的事件，都恰好像它们所流传下来的那种样子嵌入到一部世界历史里面去。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在最微小的限度之内排除了它们或改动了它们，或者加以合理化，那么我们马上也就做出了批判，而且我们也就应该知道批判意味着什么了。

既然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十分显然的就是批判的历史学必须有一个标准;于是下一件事就是要找出那个标准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看来同样清楚的便是:历史学中的信条就是——历史学家本人。这一结果是从考虑到具体的历史学实践自然而然得出来的,——而在这方面正有如在这别的方面一样,请允许我承认我有负于鲍尔^①的《教会历史学著作的各个时代》一书是何等之多^②——它也是从思考到这一普遍问题的心理方面而得出来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乃是实际的标准;而理想的标准(如其可以容许有这一反题的话)则是作为一位理所当然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而忠实于当前的历史学家,便是当然的历史学家。

这就是本书以下部分的主要思想;并且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结论,就必然要在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敌对的学说以及在我心目中所不断出现的反驳。我曾尽可能地力图避免沉闷,但并未成功;而且更糟糕的是,我担心哪怕是以沉闷为代价,我也很可能无论是在排除我自己所提出的反驳、还是在预防读者所可能出现的反驳方面,都并未成功。我认为,为了要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或然性和确凿性的全部题材就都应该加以探讨。对这个工作我觉得自己是不相称的,因此我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靠不住的。

这篇序言对于全书已经不成比例了,但是我仍然不得不在这里对宗教问题所提出的任何东西的适用性说一句结论。对我所说的东西,我是负责的;但是对任何别人所要做出的结论,我却不能。我所提出的观点乃是:每个人目前的立场都会决定他对过去一切

① 鲍尔(Ferdinand C. Baur, 1792—1860),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② 这里我可以提到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的《历史知识的规律》(*Gesetze des historischen Wissens*)和德罗伊森(Droysen)的《史学纲要》(*Grundriss des Historie*)都很简要,值得阅读,尽管我看到得太晚,未能很好地加以运用。(德罗伊森此书已收入本丛书:德罗伊森著,吕森、胡昌智编选,《历史知识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编注)

事件的信念,但是我的确并不强行规定他目前的立场应该是什么。一贯性(consistency)是我所强调过的一个词。我无法避免它,——假如任何人认为本书的结论仅只是与某种信仰相调和的话。我只能预先说,这样一个人的意见并不是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些结论仅只是在当前世界与过去世界的裂隙中间才是消极的;但是指出这样一条裂隙存在于什么地方,却不是我的事了。而对于现存的各种宗教信仰的相对真伪表示意见,则尤其不是我的事。

如果我们要以任何方式过问某些时代的历史,我们就必定要涉及基督教的原则迄今所带给宗教意识的那种因素或那种因素的一部分。而对于一个把这种因素认同于其中所存在的东西的人,或者是相信某一原则的真理应该求之于它那人世发展的开端的人,这样一项规定看来无疑地乃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并不怀疑它是至关重要的。我知道它是重要的。但是我也知道,历史的规定对于宗教信仰所必定施加的影响,其范围和一般的性质乃是一个虽则令人瞩目地易于达到一种结论、却又极其难于达到一种正确结论的题目。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早已不成其为一种美德了。除了有关的人而外,再具备它也已经不是什么优点了,它倒是正在变成一种罪恶。尤其是在涉及到宗教的地方,有一种勇气是很应该避免的,那就是说出自己(单纯)的见解的那种勇气。

我还要说的就是^①,本书以下各章无论对任何人可能有什么用处,它都不属于我,除了是在每个人所负的债都是属于他本人所有的那种意义上而外。我的债是在牛津负下的,而我利用我所借贷来的东西却远远不止于是要偿债而已。

牛津,1874年

① 我应该提到在附录注A中,我曾力图使主题适合于一般读者,而附录注E则不是为一般读者而写的。

